

第一部分

自由与权力

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

诸位同仁：今日我回想起本世纪中叶以前的一段时光，那时我正就读于爱丁堡，热切地向往着这所大学。我向三所学院提出入学申请，然而当时我却被它们一一回绝。在这里，我最初曾徒然地定下我的愿望；也是在这里，在这个时隔 45 年之后更令人愉快的时刻，它们终于实现了。

首先，我要给各位谈谈也许我有理由称为近代史之统一性（the Unity of Modern History）的历史观，对于每个担任此职的人一踏入门槛就要碰上的问题，这种历史观不失为一个方便的解决之道。我的前任熠熠生辉的名望，使我对这一职位充满敬畏。

大家经常听说，近代史是个不能确定起止日期的研究领域。没有起点，因为人类命运是被织成了一张无缝隙的密网；因为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其进程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可以不停地追溯既往，直到我们会在德意志的森林中朦朦胧胧地看到《独立宣言》。没有终点，是因为基于相同的道理，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并不能科学地加以分割，若分割开来，便失去意

义。

约翰·西利爵士曾说：“政治学若不以史学来开阔视野，便是粗俗的；史学若看不到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便退化为纯粹的文学。”每个人都觉得此言不虚。因为政治科学恰如河沙中的金粒，是由历史长河积淀而成的一门科学。而历史知识，即对经验所揭示的真理之记载，作为行动的工具和促成未来的力量，是极有实用价值的。在法国，这种重要性被赋予了对我们自身时代的研究，以至于有规定的当代史课程以及相应的教科书。在促使科学繁荣、政治昌明的劳动分工的渐进过程中，某一天我们也许会在本国发现那一教职的。同时，我们不妨承认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因为“当代”在这一点上区别于“近代”：我们不能明确地查知它的许多事实。生者不以死者的坦诚放弃他们的秘密；总有某个关键处无法确知，一代人之后我们才能了解真相。研究者都知道，通常的报道和外观表现并不能如实的反映事实。甚至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如 1870 年战争，其真实起因仍模糊不清；许多我们信以为真的事情，在过去六个月里都成为捕风捉影，重要见证人的进一步揭示仍有待出现。历史学的价值更多地依赖所获信息的可信性而非丰富性。

在可信性问题之外，是超然性问题。据发现原则和确定其作用的过程并不等于它们在实践中被应用的过程；我们最神圣最公正的信念，应当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超脱尘世的纷争与躁动。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历史学方面持一种意见，在政治学方面持另一种意见，对国外持一种意见，对国内持另一种意见，一种针对反对派，另一种针对执政派，我们便有理由鄙视他。历史学要求我们把握永恒的问题，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政治学和历

史学相互交织，但并非不分你我我们的领域超出国家事务的范围，并不受政府的管辖。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我们的职责甚至是优先考虑教会史而非世俗史，因为它涉及更重要的问题，包含着谬误的严重后果，因此是缜密的论述者和优秀的学者所要对待的首要问题。

同样，如果一种哲学总是在思索事物的起因和根源，把历史中的荣耀作为一部完整的史诗看待，它便是一种包含着智慧和深刻的哲学。然而，每位学者都应当明白，大师地位是在既定的限制之内取得的。孟德斯鸠及其学派用相同的术语称谓不同的事物，坚称自由是我们所属种族的原始状态，混淆就由这种理论而生。如果我们所要说明是思想而非事件，是观念而非武力，是赋予历史学以尊严、典雅和知识价值的精神财富，以及它对于提升人类生活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不会用民族现象来解释普遍现象，用风俗来解释文明。安提戈涅的篇演讲，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之前刻在印度岩石上的几行文字，居住于死海之畔、随着耶路撒冷的陷落而衰亡的一个沉默而有远见的民族的足迹，较之于海西山脉那些用橡果喂猪的蛮族的先人智慧，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

那么，为了我们当下的话题，我将近代史界定为肇端于四百年之前一条明显而合理的界线，把它与以前的时期区分开来，它在自己的进程中呈现出特殊的、显著的特征近代并不是按正常的顺序从中世纪过渡过来的，也不带有合法子嗣的外部特征。作为不速之客，它根据革新的法则，削弱了历史连续性的威力，为万物创立了新的秩序。在这些日子里，哥伦布颠覆了有关世界

的观念，彻底改变了生产、财富和权力的状态；在这些日子里，马基雅维里将政府从法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伊拉斯谟把古代的理智之流从世俗之沟导入基督教之渠；路德在最坚固的环节上打断了权威和传统的链条；哥白尼创造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竖起了进步的永久标志。一如神授权力之发现和罗马帝国扩张时的情形，少数哲学家表现出不受束缚的创造性和对传统权威的勇敢挑战。类似的结果随处可见，一代人见证了所有这一切。它是新生活的觉醒；世界在新的轨道上旋转着，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过去的许多年代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认为世风日下，社会不久就要毁灭；为陋习和坟墓中的主子的意志所左右。但 16 世纪出现了，它准备尝试未曾尝试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展望着充满无穷变化的未来。

这一进步运动将它与旧世界大为不同：新世界的统一性展现在探索和发现的普遍精神之中。这种精神不曾停止活动，它抵抗住了多次卷土重来的反动力量；直到我们称为革命的一般观念的时期的来临，它才最终盛行起来。对我们而言，这场从依附到独立的持续解放和渐进的过程，不论好坏都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现象，因为历史科学一直是它的工具之一。即使历史是一种羁绊和负担，对历史的认知却是最稳妥最可靠的解放手段。这种对历史知识的认真探索，是我所说的这四个世纪区别于以前世纪的一个标志。中世纪拥有一些记述那一时代历史的优秀作者，却对更早的史实漫不经心和不够耐心。他们在虚假证词的笼罩下满足于被欺骗，满足于生活在幻象的昏暗之中；他们按照便利原则去编造，高兴地欢迎着伪造者和骗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谎言被普遍地信以为真，其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

代。那时揭露假象的人文曙光落在几个思想敏锐的意大利人身上。正是在那时，历史学才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被人理解，也正是在那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至今我们仍然要在方法和资料上求助于他们。我们的世界不同于昏睡中的史前世界，它知道有必要和有义务使自己成为过去时代的主人，但又不会丢掉它们的智慧或警谕，它把自己最好的精力和才华，奉献给了探查谬误和证实可靠真理这一至高无上的目的。

在这个历史学完全成熟的时期，人们不再默然顺从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不是把一切视为当然，而是竭力想搞清楚自己存在的根据、走过的行程和个中原由。因此，史学家的重要性不断增长，超越于众人之上。稳定性的法则被不断变化的日新月异的观念力量所征服，这些观念充满生机与活力，展翅越过海洋和疆界，使得在一个孤立国度的封闭状态中寻求事物的原有秩序成为徒劳。它们强迫我们涉足于比我们更为广大的社会，熟悉遥远的异域风情，攀登更高的山峰，沿着主要方向，与不可能是一个国家所造就的各路豪杰、圣者和天才生活在一起。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巨匠前贤视而不见，必须收藏各类物品以供尽可能长久地欣赏；因为研究的无情后果就是不断地减少它们的数量。例如，展现最为强健的智力，莫过于观察拿破仑这个最著名、最有能力的历史人物的智力活动。在另一领域，熟悉了费奈隆的人格，那将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他是政治家、宗教活动家和文学家的神圣诞范，是一个世纪的见证者和下一个世纪的先驱，是穷人反抗压迫的鼓动者，是专制年代之自由、迫害年代之宽容、习惯于屈从权威的人群之人性美德的拥护者。他的一个敌人说，他的睿智足以战胜恐怖；另一个敌人说，他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因为单

是这些最伟大最优秀的智者就可以作为指导性的榜样。一个资质平平或智力较低的人，不知道如何走出自己的封闭的思想，如何使自己的意志摆脱周遭的干扰，超脱于时间、民族环境的压力之上，如果选择为自己指引道路的星辰，如何用内心的光去纠正、审查和检验自己的信念，如何依靠坚定的良知和理想的勇气，重塑出身及教育所赋予他的人格。对我们而言，倘若不去追求更高水准和更宽广的视野，国际史就会被“先有议会，后有议会文件（parliamentary reporting is younger than parliaments）”这种绝对和偏狭的理由所支配。外国人没有在他的政府中安排某种神秘的机理，没有 *arcanum imperii*（神秘物——原文为法文）。对外国人来说，政府的基础一目了然；政府机器的每一种动力和功能，可解释得像一只手表的运行一样清清楚楚。但是，由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宪法不是人为制定或写在纸面上的，而是要求遵循有机生长的法则发展；由于我们对明确的界定和普遍原则不信任，而是信赖相反的原则，我们便没有那种激烈和漫长的辩论，而其他社会却已在辩论中把政治科学最深层的秘密展示给每个能够识字的人。在费城、凡尔赛和巴黎，在加的斯和布鲁塞尔，在日内瓦、法兰克福和柏林，尤其是在美利坚合众国那些最开明的州，当它们改造自己的政制时，制宪会议的讨论达到了政治学著作的顶峰水平，提供了我们在国内从未享有过的智慧。

对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宏大课题的近代部分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是难以研究穷尽的。它是最易于把握的，因为它是最熟悉和最明晰的。较早的景象从模糊的背景中呈现出来。我们不久便陷入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处境。成百上千的近代人提供着自相矛盾的证据。可以用他们的私人通信去研究他们，依据他们自己的

供述去评判他们。他们的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每个国家都开放了自己的档案，邀请我们去探知国家的秘密。当哈勒姆（Hallam）撰述有关詹姆斯二世的篇章时，法兰西是文件可资利用的惟一大国。后来，罗马和海牙也开放了它们的档案，再后来是意大利诸国的收藏，最后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文献，西班牙也开放了它的部分文件。在哈勒姆和林加德只能依靠布里隆的问题上，他们的后继者却可查阅十个政府的外交资料。实际上，没有哪个论题已经用尽所有的资料，以至于我们可以满足于目前的成果，再也不想对该论题重新探讨。路德和腓特烈的部分生平，30年战争的片断，美国革命和法国复辟时代的许多内容，黎世留和马扎然的早期岁月，伽地纳先生的一些卷册，如同太平洋的岛屿一般在各地重见天日。虽然兰克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杰出研究的真正始创者，欧洲史学界最敏锐最成功的探索者，我也不敢说他的70卷著作中没有一卷不曾被后人赶上，不曾被部分地超越。主要是通过他不断扩大的影响，我们的学科才开始不断进步，使最杰出的导师很快便落在了更好的学生后面。单是现在对外界开放的梵蒂冈档案，在运往法国时就装了3239箱，然而其数量还不是最多的。我们仍处在文献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倾向于使历史学不再依靠历史学家，倾向于以牺牲著述为代价来发展学识，倾向于在其他学科也完成一次革命。

我愿向大家说明，我为何认为近代史非常重要。我的理由并不在于强调它有丰富的资料，亦不是因为它已同过去决裂，或革新永无止境，步伐不断加快，或意见日益压倒了信仰、知识又日益压倒了意见，而在于它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是那些未曾放弃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记录，是那些仍然

牵制着人类的步伐、困扰着人类心灵的问题的记录。它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极其珍贵的教训，这些教训是前人在他们的社会——和我们生活的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社会——中摸索出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先例和教诲，要想学到这些教训，我们只能再做尝试，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近代史研究未能使我们著书立说，只是使我们变得更明智，使我们拥有了比历史知识更有益的历史思考的才能，它也就实现了它的目的。它对于人格的形成和才智的培养，是最有力的促进因素。我们的历史判断力，无论对于公众或私人行为，还是对于来世的希望，都是大人可为的。经过近代各种事件和相互比较的锤炼之后的信念，其坚定性与力量，会大大超过那些受着每个新事物的困扰，常常比幻觉和无据的偏见强不了多少的信念。

人类的首要关怀是宗教，它是近代几个世纪的显著特征。这几个世纪以新教的发展为标志。它们从一个极端麻木、无知和衰败的时期起步，立刻便陷于那场激烈而持久的冲突之中，无人能够想像它的无穷后果。教义信仰（*Dogmatic conviction*）——因为我避免使用与当时的许多特征联系地一起的信仰（*faith*）一词——成为普遍关注的中心，直到克伦威尔时代，它仍然是公共政策的最高支配力量和出发点。然后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时期，持久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减弱，甚至势不两立的信心也不再那么精力旺盛，于是好斗的精神开始为科学精神留出了余地；暴风雨过后，出现了一片尘埃落定的场地，许多争论都留给史学家们去沉稳而祥和地解决，他们本来就具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把宗教事业从诸多不公正的谴责中，从更为有害的公正谴责中拯救出来。兰克常说，在七年战争之前，教会的利益支配着政治，它标志着社

会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结束于勃兰登堡的主人们唱着他们的路德教圣歌在卢蒂尼亚采取的行动。那个大胆的主张即运用于今天这个时代，仍是可以质疑的。当罗伯特·皮尔爵士解散了他的政党时，追随过他的领导人便宣布，没有任何天主教教义能够成为使它重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强调指出，在 1870 年 7 月，即法国战争爆发时，惟一坚持废除教会世俗权力的政府是奥地利；此后我们便目睹了卡斯特拉尔的下台，因为他试图调和西班牙同罗马的关系。

1850 年后不久，几个最聪明的法国人对本国人口增长受到抑制和“未来不列颠”（Further Britain）突增的人口统计数字深感不安，预言英吉利民族的优势地位即将到来。他们没有预见到——当时谁都未预见到——普鲁士更加迅猛的崛起，以及世界上这三个最重要的国家，到本世纪末会成为基本上皈依宗教改革的新教各派的国家。因此，这几个世纪，对于宗教正如对于众多事物一样，一直促进着新事物的产生；引力中心从地中海国家转向大西洋国家，从拉丁族转向条顿族，同时也从天主教转向新教。

历史科学同政治科学一样，从这些争论中脱颖而出。正是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前的清教徒时代，神学与政治学携手实现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17 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变革，其本质与其说是教会之争，不如说是教派之争，分裂常常是由于戒律和自律方式（self-regulation）的不同，而非教义的不同。各个宗派并没有控制国家的野心，他们更多地关心着个人而非信众，热衷于宗教秘密会议而不是国家一级的教会。他们虽视野狭窄，却又目光敏锐。他们认为，政府和制度如同尘世万物一样，注定是要消亡的，而灵魂却是不朽的；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恰如在永恒和时

之间，根本不存在可比性；因此强制命令的范围应当控制在确定的界限之内；过去由权威、外部戒律和有组织的暴力所为之事，应当采取分权的方式处理，并委之于自由人的理智和良心。于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由理性对理性的支配所取代。宽容的真正使徒，并不是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寻求保护的人，也不是那些没有信念可保护的人，而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不论他们的事业如何，宽容都是一个政治、道德、神学的信条，一个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的良知问题。这样的人就是索齐尼，以及一些更小派别的人们——罗德岛殖民地独立的创建者，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主教。用于鼓吹信条权威的大量精力和热情，也被用于预见中的自由。空气中弥漫着发出新呐喊的热忱，但是事业未变。它成为一种自诩：宗教是自由之母，自由是宗教的嫡传；宗教思想的发展对政治生活之既定形式的这种转变和颠覆，将我们带到了我的论题的核心，为我们展现了历史循环之重要的关键特征。它的起点是历史上那场最强大的宗教运动和最优雅的专制统治，它导致了各国生活中的政治高于宗教。最后，结束于一种平等的要求：每个人在履行天职时都不应当受到其他任何人的约束——这是个携带着风暴和破坏力的信条，是人权（the Rights of Man）的内在实质和革命颠扑不破的主题。

如果我们考虑到敌对势力的情况、他们持续的抵抗和一再崛起，考虑到在 1685 年、1772 年、1808 年这些斗争似乎永无成功希望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若没有 17 世纪宗教动机所提供的威力，世界朝向自治的进步便会束手就擒。这种朝向有组织有保障的自由状态的不断进步，是近代史诸多事实的特征，是它对神学理论的贡献。我确信，许多人会发现这是种陈词

滥调，老生常谈，会质疑这样的结论：世界虽无多大进步，但智力是个例外，它正在获得自由，或自由的增长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个成果。我的导师兰克便反对前述观点，孔德这位更优秀者的导师，认为我们在死人之手的合力重压之下，拖着一条越来越长的链条；我们许多晚近的一流作家——卡莱尔、纽曼、弗劳德——认为，在证明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上，并无进步可言，若仅仅是自由得到了加强，这就如同朝着尾巴方向前进的生物运动一样。他们认为，针对坏政府而急于采取的防备措施，是通向美德的障碍，它使能者受制于无能者，为庸碌众生的利益而放弃开明的品德，因而败坏道德和灵魂。他们坚信，为人类所做的伟大而有益的诸事，都有赖于权力的集中，而非权力的平衡、抑制和分散；源于正在消亡的宗派的辉格党理论，即惟有受到制约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权力，统治须赖臣民的同意，是对世代相传的那种神圣意志的背叛。

我陈述以上反对意见，不是为了陷入与我们不一致的一门学问的激烈争吵，而是为了借助于界定对立的说法以表明我的主旨。在此，没有任何政治信条比史学家的如下格言更能说明我的意图：尽可能替对方考虑，避免自己的偏执和自负。这就像 18 世纪的一句源于柯尔贝尔的经济学格言“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在创立方法上即使它不是定论，也是重要的一步。不错，像麦考莱、梯也尔和当代两位最伟大的作家蒙森和特赖奇克这样最具感染力的人物，把自己伟岸的身影投射于他们的著作之中，这种做法对伟人是合适的，而且一个伟人也许抵得上几个完美的历史学家。然而这句谚言自有道理：史学家不露面时，才会有最杰出的表现。我们更恰当的榜样是牛津主教，除了他面前的事

件，他从不说明自己的想法；还有他著名的法国对手福斯泰尔·德·库朗热，他对一群兴奋的听众说：“不要以为你们是在听我说话，这是历史自己发出的声音。”除非考虑到三千年的历史，我们便不能在这四百年的历史观察中发现哲理。这会是一个片面而错误的诱导。但是我期望，即使这段短暂而难以启迪人智的历史，也有助于大家看到，超然于他所要拯救的人类之上的基督，他的行动并未失败，而是还在加强；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已经获得的自由是个道德成果，它有赖于进步文明的各种条件的汇合和共同作用。然后，你们才会理解一个著名哲人的所言：史学是对宗教的真实证言。

有人宣称自由是勋章，是奖品，是桂冠。既然自由是个具有两百种定义的概念，而且除了神学之外，这一大堆解释引起的流血远甚于任何事物，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自由是指法国的民主，或是指美国的联邦制度？是指意大利人所关注的民族独立，还是指德国人理想中最优秀者的统治？敝人不知如下工作是否会进入我的职责范围：穿越我们盛衰多变的历史景观，去追索自由观念的缓慢进程；去描述那些触及良知本质的深邃思考如何促进了一种维护良知的更崇高、更神圣的自由观，直到权利的卫士变成作为权利之原因的义务的卫士，直到作为尘世财富的物质保障而受到奖赏的自由，因为保障着一切宗教活动而变为神圣。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把进入历史的平凡的钥匙；不必停下来讨哲学家的欢心，我们当前的愿望也可得到满足。我们不必探询，在上帝的人间代理是否永无谬误这个问题上，萨拉萨或巴特勒、康德或维内所持的观点有几分道理，也可顺利达成以下共识：只要绝对专制的统治依赖的是无敌的武器、集中的财富、御

用的教会和残忍的法律，它的统治便会崩溃；崛起的商业反对土地，劳动反对财富，国家反对社会的支配势力，分权反对国家，个人思想反对历代习俗，因此无论什么权威，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都不能要求绝对的服从；哪里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考验，存在着对于可靠的信念和累积的知识保护，哪里存在着相当水平的普遍道德、教育、勇气和自制能力，哪里（即使只有这一个地方）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迈着不同的步伐，通过克服种种失败，向它所展示的生存状态前进。各位从以下现象即可了解这一点：代议制、奴隶制的废除，舆论的统治，等等；通过较不明显的事例，也会更好地体会到这一点：对弱势群体和良心自由的保护，它们在受到有效保护后，又保障着另一些自由。

说到这里，我的论点有陷入自相矛盾之虞。如果社会高高在上的征服者所以取胜，更多地是依靠暴力而不是温和的技艺，如果事物的发展趋向就是走向动荡和灾难，如果世界将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将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将联邦共和制归功于美国革命，将政治平等归功于法国革命及其追随者，那么，我们这些沉湎于既往的忠实而专注的学者又该如果是好呢？革命者的凯旋使史学家无立足之地。上个世纪那场大革命，通过它的权威阐释者杰斐逊和西哀士，否定了史学。他们的信徒宣告与历史决裂，并且随时打算销毁历史文献，赶走并不碍事的历史教授。然而，出人意料的真理简直比虚构的故事还要离奇，它表明这并不是史学的末日，而是它的复兴。在进步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倒退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一种动力，它使作为文明要素之一的史学，发挥了较以往无可比拟的更大作用。一场思想领域

的运动开始了，它比古代学问的复兴更加深入人心，意义也更为重大。主宰着我们生活和劳作的天命，首先体现于对否定发展规律的消极精神的反抗，其次体现于分析并纠正革命，根据历史因素的固有作用对它加以说明的努力之中。保守派作家，即以浪漫主义或历史主义学派之名在德国享有地位的作家，将大革命视为一个反常的插曲，一个时代的错误，一种需要用追根寻源的方式加以根治的疾病，他们竭力想把断裂的历史脉络再联结在一起，恢复有机进化的正常状态。自由主义学派的故乡是法国，它将大革命辩解为一种真正的进步和全部历史的成熟果实。这就是那一代人的两种主要论点，我们把一些观念和科学方法归功于他们，而正是这些观念和科学方法，使得历史学大大不同于上个世纪人们眼中的历史学。严格而言，创新者并不比古人高明。穆托拉里见多识广，德蒂耶蒙严谨准确，莱布尼兹能力过人，弗里尔特目光犀利，吉本的综合整理的技能亦堪称大师。然而，在本世纪过去四分之一时，历史学家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事物头绪纷繁，我只想特别说明三点，它们构成一个正确的顺序。对于如洪水般不断涌来的不容怀疑的新课题，我无需说些什么。教皇的秘密档案在巴黎开放有一些年头了，但是有效利用的时间尚未到来，除了档案员本人，几乎无人接触过它们。时至 1830 年，文献研究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奥地利处在领先地位。1836 年前，米什莱可以称为先驱，此后即被诸如麦金托什、布霍尔茨和米涅这些对手所超过。30 年后，即当 1859 年的战争完成对意大利的分赃时，一个新的更多产的时期开始了。各国虽有先后，但现在都已允许对其文献进行研究。对溺死的恐惧，已胜过饥渴之苦。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穷尽一生尽量收集已经出版的著作，仍不足以培

养出近代史学的真正大师。一个历史学家，在他的研究从著作转向原始资料，从伯内特转向波考克，从麦考莱转向坎帕纳夫人，从梯也尔转向波拿巴家族的大量通信，他仍会迫切地感到，有必要去查阅威尼斯或那不勒斯、奥苏纳图书馆或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资料。此时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事情。因为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需要学会的主要不是积累资料的技术，而是分析资料，辨别谎言与真相、可疑与可靠的更为重要的技术。历史研究充实、匡正和扩展思想所依靠的，不仅是博学多闻，更是有力的批判。那些不倦的编纂者、妙笔生花的叙述者、技巧娴熟的人物描绘者、能言善辩的劝善者等等，如果他们的位置被批判者们所取代，将无异于史学王国中的一次政府更迭或改朝换代。因为，所谓批判者，就是这样一种人，当他把视线投向一段有趣的陈述时，他是从怀疑它开始的。在他的权威没有对三个步骤表示认可之前，他是不会放弃怀疑态度。首先他要询问，他所看到的句子，是否就是原作者所写下的句子。因为转述者、编者和编者之上官方的或滥用权力的审查官，可能在文字上玩弄花招，对原文做了不少篡改。如果这些人没有过失，也有可能作者本人重写了著作，你可以去查找第一稿，找出后来的改动，增加了什么，删去了什么。其次要询问的是，作者从何处获得信息。如果来自过去的一个作者，这可以得到查证，但仍要对后者提出相同的质询。如果源自未刊文稿，必须追溯它们的来源，当达到了源头或线索消失时，真实性的问题便出现了。有关作者的性格、社会地位、家世和可能的动机，也必须予以探究；从“批判”一词的另一个恰当的含义说，较之于苦役式的、常常是机械的追寻文字来源的工作，这就是所谓更高层次的批判。因为必须把历史学家当